



2025 年届会

2024 年 7 月 25 日至 2025 年 7 月 30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10

发展合作论坛

国际发展合作趋势与进展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秘书长根据大会第 [61/16](#)、[68/1](#)、[69/313](#)、[70/192](#)、[70/299](#)、[75/290 A](#) 和 [76/258](#) 号决议提交本报告，供发展合作论坛审议。本报告载有对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趋势和挑战的分析，强调需要加强国家自主权和领导权，减少分散现象，解决资源分配问题，加强与国家需求和优先事项的协调，并提高实效。报告呼吁扭转官方发展援助流动的趋势，特别是在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比例方面，重新将发展合作的重点放在质量、影响和实效上，并改革全球和国家两级的发展合作架构。报告提出了使国际发展合作适合当今背景情况的建议，供 2025 年发展合作论坛和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审议。¹

* [E/2025/1](#)。

¹ 本报告是与以下方面的工作人员协商编写：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事处、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和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非洲顾问办)。非常感谢他们的贡献。



一. 引言

1. 自 2015 年《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通过以来，对国际发展合作以消除贫困和不平等、满足社会需求以及投资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因不断上升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气候和灾害相关风险的影响而加剧。各国偏离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轨道，目前的预测估计，到 2030 年，近 6 亿人将继续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其中一半以上是妇女。据估计，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金缺口每年在 2.5 万亿至 4 万亿美元之间。²

2. 与此同时，官方支助的分配，特别是官方发展援助的分配，已从长期发展和国家方案转向减缓气候变化、人道主义援助和捐助国内部支出，例如用于难民的支出，这反映了捐助国优先事项的变化。国际发展合作格局也变得更加复杂，各行为体、方式和手段更加多样化。虽然这种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也增加了分散、协调挑战和交易成本。

3. 这些转变突出表明，既需要增加资源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也需要提高各种形式国际发展合作的质量、影响和效力，特别是使其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4. 需要更多的赠款和优惠资源，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脆弱国家，如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来说。还需要多边开发银行提供更多的非优惠资源，以帮助满足更广泛的需求，同时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促进满足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需求，作为南北合作的补充。

5. 本报告分析了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趋势和挑战，侧重于分析发展中国家不断变化的需求和优先事项、发展伙伴官方发展援助分配的变化以及发展合作格局日益纷繁复杂的情况。在此过程中，它强调需要更多地调动优惠资源、更好地利用和更好地证明影响，以及改革发展合作架构的必要性。

6. 即将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3 日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举行的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提供一个重要机会，可以重新承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兑现官方发展援助并商定履行承诺的步骤，同时可制定改革措施，使国际发展合作在日益复杂的全球背景下更加适合目的。2025 年 3 月 12 日和 13 日将在纽约举行的发展合作论坛为在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之前推进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该论坛可以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所有行为体提供空间，共同考虑当今国际发展合作的宗旨，以此为基础，就现有承诺和新出现的需求采取振兴行动。论坛还可提供空间，推动讨论发展合作的交付方式和与国家优先事项和需求的协调，以及更广泛的发展合作行为体之间的伙伴关系和协调。

² 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2024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处于十字路口的发展筹资》(2024 年，纽约)。

二. 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发展合作的需求日益增加和多样化

7.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日益受到全球挑战影响的各种不断变化的需求、脆弱性和优先事项。更极端和更频繁的冲击的影响，加上持续和/或加剧的贫困和不平等、粮食不安全和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正在扩大和加深整个发展中世界的投资需求。其中许多挑战相互关联、相互重叠，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为复杂。³

8. 这些挑战如何影响不同类别的发展中国家，揭示了解决其不同需求和优先事项的复杂性。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由于结构脆弱性以及人力和体制能力有限，继续面临社会和经济各部门的挑战。⁴ 内陆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经济多样化和能力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贸易和运输成本比沿海国家高出 1.4 倍。⁵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气候变化的生存威胁，同时还在努力应对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 73% 的外债水平。这些国家迫切需要获得优惠资金，以加强其可持续发展前景，同时支持气候复原力，防止转型期间的社会经济倒退。⁶

9. 由于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未满足的发展融资需求以及在获得优惠融资方面的差距，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轨迹仍然不稳定，这些国家占世界贫困人口 62%，即 4.34 亿。⁷ 尽管中等收入国家在 2021 年获得了 1114 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几乎占全球总额的一半，但与需求相比仍然很低。⁸ 中等收入国家在从优惠融资“毕业”的同时仍然面临持续的脆弱性，这是一个特别的挑战。这些国家往往在努力加强国内资源调动和投资的同时失去获得支持的机会。中等收入国家主张联合国发展系统推动全系统的应对措施，以更好地应对这些国家的具体挑战和各种需求。

10. 处于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的国家面临着持续贫穷、人力资本下降、政治不稳定和机构能力薄弱等问题。⁹ 解决这些国家的需求和挑战需要加强优惠融资、加强协调以及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

³ 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2023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2023 年，罗马)。

⁴ 见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改善最不发达国家的融资渠道》(2023 年)。

⁵ 见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审查为执行<内陆发展中国家 2014-2024 年十年维也纳行动纲领>而开展的南南合作》(2024 年，纽约)。

⁶ 见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发展筹资》(2022 年)。可参阅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4060309?v=pdf>。

⁷ 见 www.worldbank.org/en/country/mic/overview。

⁸ 见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第 155 号政策简报，“加快中等收入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2023 年 11 月 29 日)。

⁹ 见世界银行，“赋能脆弱国家：国际开发协会在受影响地区和弱势国家的战略作用”(2024 年 10 月)，可参阅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4d9f3d42dedc0bb5eb452fbf887ec0c5-0410012024/related/Empowering-Fragile-States.pdf>。

11. 随着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增加和范围的扩大，综合指标作为对长期以来基于收入的措施的补充，在指导获得国际支持，特别是优惠融资的机会和资格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多维脆弱性指数是一个重大进步，它提供了对结构脆弱性的评估，包括对气候风险的承受能力，同时还通过国别概况考虑到复原力因素。¹⁰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多维脆弱性指数制定问题高级别小组发现，很大一部分脆弱国家面临高度的结构脆弱性。¹¹ 《未来契约》中关于启动“超越国内生产总值”工作的决定，也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目的是摸清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和需求。

12. 发展界还采取了更有活力和更综合的办法，以更好地应对国家的需要和脆弱性。全球风险评估框架提供了建模工具，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面临气候灾害、大流行病和经济波动等外部冲击的国家的资金需求。¹² 基于预测的融资可以加强应急和预测性融资能力。^{13, 14} 根据结构性差距办法，发展进程被视为一个不断演变的连续体，其中一些问题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解决，而另一些问题则会出现或加剧，¹⁵ 强调必须调整合作战略、模式和手段。可持续毕业支助机制¹⁶ 等举措说明了如何将更细致入微的理解脆弱性的方法转化为实际的支持机制。

13.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首次提出的综合国家融资框架已被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作为国际社会提供的这些工具和其他工具的对接站。这些工具正在支持更了解风险的决策，并可用于进一步将多层面脆弱性纳入筹资政策选择的主流，以及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和国家背景下确定需要国际支持的国家优先事项。

14. 政策建议：

- 根据国家计划和发展合作政策及协调机制中规定的国家需求和优先事项，保障核心发展合作，包括官方发展援助，以满足各国的长期发展需要。
- 加强对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系统性风险的评估，将多层面脆弱性衡量标准与传统衡量标准结合起来。

¹⁰ 见 www.un.org/en/desa/why-multidimensional-vulnerability-index-mvi-matters。

¹¹ 见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2024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见脚注2）。

¹² 见 www.preventionweb.net/understanding-disaster-risk/graf。

¹³ 见联合国，“《我们的共同议程》政策简报4：重视有价值的东西-超越国内生产总值的框架”，2023年5月(EOSG/2023/4)。

¹⁴ 见“Beyond GDP: how to count for people and planet”，全球政策观察组织，可参阅：<https://www.globalpolicywatch.org/futureofglobalgovernance/index/e-beyond-gdp/>。

¹⁵ 见拉加经委会，《转型期发展：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恢复合作的概念和计量建议》（2021年，圣地亚哥，可参阅 <https://www.cepal.org/en/publications/47167-development-transition-concept-and-measurement-proposal-renewed-cooperation-latin>。

¹⁶ 见 www.un.org/ldcportal/content/sustainable-graduation-support-facility。

- 更好地反映脆弱性和结构性差距的分配框架，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而言。
- 发展合作模式和工具适应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国情，与这些国家的优先事项和需求保持一致，同时促进使用国家系统和成果框架。

三. 国际发展合作的趋势以及行为体和机制的多样化

15. 自 2000 年以来，国际发展合作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包括官方发展援助在内的国际发展合作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发展合作行为体的数量和多样性急剧增加，这增加了协调方面的挑战。

官方发展援助

16. 尽管官方发展援助在 2023 年达到创纪录的 2 237 亿美元，按实际价值计算比新千年开始时增加了一倍多，但官方发展援助未能跟上不断增长的需求。官方发展援助仅占捐助国国民总收入的 0.37%，远低于联合国半个世纪以来设定的 0.7% 的目标。只有五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丹麦、德国、卢森堡、挪威和瑞典——在 2023 年达到或超过了这一目标。¹⁷ 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仍低于占国民总收入 0.15%-0.20% 的目标，2022 年仅占国民总收入的 0.08%，低于 2012 年至 2021 年平均 0.09% 的水平。¹⁸ 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也仍然很低，仅占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 2%，尽管这些国家的脆弱性不断上升，自 2015 年以来仅增加了 0.7%。需要重振势头，以实现官方发展援助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承诺，包括将有时限的官方发展援助增加到发达国家国民总收入的 0.7%，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至少达到国民总收入的 0.2%。

17. 自《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通过以来，官方发展援助的分配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反映了不断变化的全球优先事项和新出现的挑战。资源越来越多地用于气候融资、其他全球公共产品和人道主义援助，包括捐助国难民费用，而远离长期可持续发展成果。对全球公共产品的双边援助从 2007-2011 年期间的 37% 上升到 2017-2021 年期间的 60%。¹⁹ 捐助方的难民费用和人道主义援助占官方发展援助净额总额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9% 左右增加到 2022 年的 25%。²⁰ 国家

¹⁷ 见“继 4 月 11 日发布 2023 年官方发展援助数据后，对《2024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的数据更新”，可参阅 https://financing.desa.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4/FSDR_2024_ODA_Data_Update_April_2024_update.pdf。

¹⁸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事处对本报告的正式贡献，2024 年 11 月。

¹⁹ 见 Kerry Elgar 等人，“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the provision of global public goods”，经合组织发展合作工作文件，第 111 号，(2023 年 5 月，巴黎，经合组织出版社)。可参阅 <https://doi.org/10.1787/aff8cba9-en>。

²⁰ 见“秘书长关于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的报告”(2024 年)(A/79/285)。

可规划援助-可预测并可到达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部分——已降至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一半以下，²¹ 实际上减少了根据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提供给它们的援助数额。

18. 官方发展援助的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22 年官方发展援助中赠款的比例降至 63%，²² 这是二十年来的最低比例，因为捐助方在面临经济压力时试图进一步利用其官方发展援助预算。然而，这一趋势给许多国家，特别是重债国带来了严峻挑战。

19. 在捐助国发展合作预算有限的背景下，这些趋势使官方发展援助的分配偏离了国家的需要和优先事项。例如，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自 2020 年以来有所下降。自 2013 年以来，最不发达国家在极端贫困中获得的人均援助少于中上收入国家，这表明官方发展援助对贫困和不平等的关注减少。在内陆发展中国家，尽管这些国家面临严峻的物流和基础设施挑战，但自 2009 年以来，对运输和储存部门的官方发展援助一直在稳步下降。尽管预测 2015 年至 2030 年灾害数量将增加 40%，而且人们认识到投资于防灾的重要性，目前，官方发展援助只有 0.5% 用于防灾和备灾，而近 11% 用于应急和重建。

20. 政策建议：

- 在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有时限地增加官方发展援助，以实现官方发展援助目标，包括国民总收入的 0.7% 和对最不发达国家的 0.15%-0.20%。
- 通过具有明确目标的可列入国家方案的援助增加供资，以扭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不断减少的趋势；根据国家情况酌情增加预算支持（见第五节）。
- 增加对脆弱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赠款融资和能力支持。
- 鉴于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具体挑战和不同需求，向它们提供协调一致和包容性的支持。
- 更加注重能力发展支助，以调动国内资源，帮助各国减少长期对官方发展援助的依赖。

南南和三方合作

21. 南南合作已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一个变革因素，是南北合作的补充，其目的是促进全球南方的团结和共同发展。南南合作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南方

²¹ 见 Elgar 等人，“The role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the provision of global public goods”（2023 年，经合组织）。

²²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应对小组”，基于经合组织的数字（2023 年 12 月）。

内部以及与全球经济的贸易和投资。南南贸易目前占全球南方贸易总量的一半以上，反映了其在生产多样化和应对价值链挑战方面的作用。

22. 三角合作也已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模式，通过发展伙伴提供的资金、多边技术专长和受援国的执行，加强南南知识共享，同时利用南北伙伴关系。然而，三角合作的份额仍然不大，占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主要捐助国分配的官方发展援助的不到 0.1%，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占 47%。²³

气候资金

23. 尽管气候融资在官方发展援助中所占份额有所增加，但包括适应融资在内的气候融资仍然严重不足，无法有效应对气候挑战的规模，特别是在最脆弱的国家。对于如何确保为减缓气候变化和其他具有全球公益性质的领域提供额外的支持，人们仍然感到关切。2024 年 11 月 11 日至 22 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商定了到 2035 年每年 3 000 亿美元的新集体量化目标。虽然这比先前的 1 000 亿美元目标高出三倍，但估计需求要大得多，为每年 1.3 万亿美元。²⁴

24. 2023 年底设立的应对损失和损害基金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反映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对气候变化负有主要责任，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以应对气候灾害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损失和代价高昂的损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各国政府承诺向该基金提供约 7 亿美元。发达国家需要作出更多的财政承诺。

多边和其他公共开发银行

25. 过去二十年来，多边开发银行贷款大幅增长，年发放额从 2000 年的 300 亿美元增加到 2022 年的 960 亿美元。然而，优惠资金的比例已经下降，从 2004 年占多边开发银行贷款总额 35% 的峰值下降到 2022 年的 13%。虽然国际开发协会第 21 轮增资获得了历史上最大一笔资金，但鉴于需求不断增长，还需要更多的支持。高利率对国际开发协会通过资本市场利用资源的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使得最贫穷国家的借贷成本从 2022 年上一轮增资时获得每一美元捐助需付 2.96 美元上升到 3.22 美元。此外，从国际开发协会第 20 轮开始，赠款的实际价值预计将下降，任何国家可以获得的最高金额将从 10 亿美元降至 6.5 亿美元。²⁵

26. 2022 年，20 国集团对多边开发银行资本充足框架的独立审查为多边开发银行提出了建议，以优化其资源和资产负债表的使用，这是 2015 年《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要求。多边开发银行正在实施或考虑改革措施，以进一步增加

²³ 经合组织，债权人报告制度(数据库)，<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CRS1>。

²⁴ 见“提高雄心并加速提供气候融资”，气候融资问题独立高级别专家组第三次报告，2024 年。可参阅 https://www.lse.ac.uk/granthaminstitute/wp-content/uploads/2024/11/Raising-ambition-and-accelerating-delivery-of-climate-finance_Third-IHLEG-report.pdf。

²⁵ 《经济学人》，“The World Bank is struggling to serve all 78 poor countries”，2024 年 12 月 12 日，可参阅 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24/12/12/the-world-bank-is-struggling-to-serve-all-78-poor-countries。

贷款，这可能在未来十年产生 3 000 亿至 4 000 亿美元的额外能力。²⁶ 虽然一些国家也表示有兴趣通过多边开发银行重新引导未使用的特别提款权，但政治挑战依然存在。鉴于巨大的融资需求，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需要额外增加资本，以克服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融资挑战，特别是在最脆弱的国家。

27. 国家公共开发银行日益被视为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确保为各国可持续发展需求和优先事项提供资金的重要工具，这些优先事项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以及最近应对气候变化。国家公共开发银行通常比商业银行提供更长期的资金，从而延长投资者的时间范围，并更好地将金融期限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相结合。国家开发银行也是发展合作中越来越重要的行为体，约有 112 家公共开发银行参与国际发展融资。²⁷ 自 2015 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公共开发银行之间的协调和网络联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有 500 多家公共开发银行参加了 2023 年 9 月 4 日至 6 日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举行的共同金融峰会。多边开发银行之间以及多边开发银行与其他公共开发银行之间更密切的合作可以加强整个开发银行系统并产生更大的影响。

新的非国家行为体和伙伴关系的崛起

28. 自 2015 年以来，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作用，特别是慈善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也显著扩大。私人慈善事业包括私营或非营利部门为支持发展而发起的交易，在 2020 年筹集了约 96 亿美元的赠款，其中 56% 分配给全球卫生倡议，10% 分配给民间社会倡议。²⁸

日益分散和复杂

29. 虽然各行为体、交付渠道和执行实体的扩大有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获得各种支助来源的机会，但也增加了协调方面的挑战，增加了交易成本，并使实现国家自主权的努力复杂化。提供官方资金的组织、基金和方案的总数从 2002 年至 2006 年的平均 62 个增加到 2017 年至 2021 年的 112 个，反映了新的行为体的出现和新的多边机构的创建。在此期间，共有 350 个新实体(288 个双边实体，62 个多边实体)开始提供发展资金。²⁹ 仅在气候领域，截至 2022 年，就有 82 个活跃基金，包括 62 个多边气候基金以及双边、区域和国家基金。³⁰

30. 在行为体激增的同时，捐助方承诺和项目的资金规模也在减少。从 2000 年至 2021 年，官方发展援助赠款规模按实值计算减少了一半，从平均 170 万美元

²⁶ 见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2024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见脚注 2)。

²⁷ 见 Jiajun Xu 等，“Art in the doing: Public development banks serving public policies”，2023 年 8 月，可参阅 <https://financeincommon.org/art-in-the-doing-public-development-banks-serving-public-policies>。

²⁸ 见 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philanthropy-as-development-finance-the-new-normal。

²⁹ 见世界银行《为未来融资：国际开发协会在不断演变的全球援助架构中的作用》，(2024 年 4 月)。

³⁰ 见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2024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见脚注 2)。

减少到 80 万美元。渠道的扩散使发展合作的管理和协调更加复杂，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执行能力已经很弱的国家，如最不发达国家，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加重了它们的体制能力的负担，增加了交易成本。³¹

31. 与此同时，指定用于具体部门或主题的发展合作数额大幅增加。五个最大的基金(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免疫联盟、疫苗联盟、绿色气候基金、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和全球环境基金)现在比多边开发银行的捐款多出 92 亿美元。³²

32. 国际非政府组织已成为官方发展援助和慈善资金的主要受益者，从经合组织发援会捐助者获得了 90%以上分配给民间社会的资源。国家非政府组织获得的资金份额有限，阻碍了确保地方在项目设计和执行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的努力，而这种努力是将干预措施与地方需求和背景联系起来的关键要素。

33. 为应对这些挑战，一些双边机构正在改变其供资模式。促进地方主导的发展合作的创新办法已经出现，例如赞比亚治理基金会率先提出的“反向征集建议”。³³这一举措使当地社区行为体聚集在一起，与赞比亚的国家办事处一起向国际非政府组织提出优先需求，改变了传统的提案动态。³⁴在采取更多由地方主导的办法时，发展伙伴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提供短期成果以应对紧急需求，并注重长期影响；另一种是采用严格的尽职调查程序以尽量减少风险，并利用合作来创新和测试新办法。

34. 展望未来，关键的考虑因素包括通过简化和精简申请程序来降低交易成本，定期评估资金和窗口状况以确定整合的机会，特别是气候基金，同时保持多样化资金来源的好处，以及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参与。各国还可以通过国家主导的协调平台，更好地管理分散的发展合作。

35. 政策建议：

- 双边和多边伙伴对程序和要求采取更加一致和简化的办法。
- 加强不同筹资倡议和机制之间的互补性，同时保持其独特的任务和价值。
- 加强区域组织在促进面临类似挑战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知识共享方面的作用。

³¹ 见世界银行，“为未来融资：国际开发协会在不断演变的全球援助架构中的作用”，(2024 年)。

³² 见 Akihiko Nishio 和 Francisco G. Cherichiro，“Balancing act: maximizing leveraging global aid for greater impact”，世界银行博客(2023 年 12 月 21 日)，可参阅 <https://blogs.worldbank.org/en/voices/balancing-act-maximizing-leveraging-global-aid-greater-impact>。

³³ 赞比亚治理基金会是一个促进捐助者赠款并向赞比亚当地民间社会组织提供能力发展支助的平台。

³⁴ 见 www.zgf.org.zm/reverse-call-for-proposals/。

- 多边开发银行更深入地参与，多边开发银行与其他公共开发银行、发展伙伴和联合国系统在全球、区域、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加强合作。
- 加强在优惠贸易和投资安排以及获取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的南南合作。

四. 计量数量 and 影响

36. 更好地计量发展合作流量的数量和质量有助于履行承诺和建立信任。关于更好地计量发展和气候影响的包容性对话可以提高发展合作的质量，支持与国家需求和优先事项相一致的分配决定，并有助于评估发展融资和气候融资之间的协同增效、重叠部分和共同利益，以及差异和额外性。

计量流量

37. 各方作出了多种努力，以更新和改进对发展合作(包括官方发展援助和南南合作)的各项流动的计量，以及对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总体情况的更广泛指标的计量。

38. 2012 年，经合组织发援会启动了官方发展援助计量现代化进程，以更好地反映它们如何看待不断变化的发展合作格局，并增加调动资源的激励措施。其中包括澄清和平与安全的资格规则(2016 年)，捐助国为援助难民的费用(2017 年)和与移民有关的活动(2022 年)；采用赠款等值制度来计量官方发展援助(2014 年)；就债务减免的处理达成共识，规定最高限额等于官方发展援助债权债务减免原始贷款的名义价值(2020 年)；最近，还商定了官方发展援助中处理私营部门信用工具的修订方法，该方法将于 2024 年生效。

39. 然而，经合组织发援会捐助方目前的一些做法有可能损害官方发展援助作为问责制和可持续发展影响基准的可信度。例如，尽管规则限制了此类费用的计算，捐助国为援助难民的费用从 2021 年占官方发展援助的 4.6% 上升到 2023 年的 14.4% 以上。在 2014 年赠款等值制度下，高贴现率会使官方发展援助总额膨胀，即使是接近市场的贷款也是如此。将私营部门信用工具纳入官方发展援助计量的方式引起了将非减让性私营部门投资算作官方发展援助的问题。

40. 官方发展援助的计量也显示出重大差距。在促进性别平等的计量方面，缺乏按性别分列的官方发展援助严重制约了决策者。官方发展援助供资的数据项目中，只有一半将 0.05% 以上的资金用于与性别有关的举措。对 74 个国家进行的审查显示，虽然约三分之二的国家在其战略中提到性别统计，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国家为此类数据收集提供专项资金，这突出表明所述优先事项与资源分配之间存在重大脱节。

41. 关于南南合作，各国的做法、模式和手段各不相同，因此很难制定一个共同的定义和量化趋势。联合国计量南南合作概念框架的制定标志着在计量南南合作方面的一个突破，使财务和非财务层面都得以量化。该框架是由南南合作问题小组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发展支助计量工作组的一部分

制定的，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7.3.1 “从多个来源为发展中国家调动更多财政资源” 提供了信息。³⁵ 贸发会议与联合国区域委员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合作，于 2023 年启动了一个能力建设项目，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八个试点国家测试该框架。

42.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7.3.1 反映并借鉴了为改善不同发展资金流的计量框架所做的努力。该指标从受援国的角度出发，包括官方赠款、官方优惠和非优惠贷款、外国直接投资、在试验基础上调动的私人资金和私人赠款的总收入。官方对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支持国际论坛(其秘书处设在经合组织)和贸发会议负责对这一指标进行全球监测。数据来源包括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论坛、经合组织和贸发会议建立的现有数据库。

43. 要改进国际公共财政的计量，就必须认识到，不同的供资目的服务于不同的目标，应根据其本身的优点加以评估。这一办法建议考虑三大类，每一类都有具体的计量框架。首先，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重点是减贫和经济增长，这要求计量标准与长期发展成果相一致。第二，人道主义支持和危机应对，包括大流行病、冲突和自然灾害，需要单独的目标，以确保可预测的资源满足当下的需求。第三，全球公共产品的融资，包括与气候相关的融资，需要不同的框架来评估公共融资工具及其调动私人资金的能力。

44. 新的气候融资目标是每年筹集至少 3 000 亿美元，包括公共和私人资金来源。然而，计量从不同来源的气候融资面临着影响资源跟踪和分配的挑战。关键问题包括定义和数据收集方法不一致，这增加了发展和气候相关融资之间的重复计算，并削弱了核实气候融资是否“新的、额外的”能力(见大会第 79/195 号决议，第 10 段)。此外，私营部门行为体的报告有限，使人们无法了解它们对气候举措的贡献。这些计量方面的挑战尤其影响到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脆弱国家。加强官方发展援助和气候融资报告的一致性和透明度，改进对影响的计量，制定补充目标，可以更好地支持气候议程和发展议程的资源调动。

45. 政策建议：

- 制定互补办法，计量尊重不同宗旨和原则的不同形式的发展合作。
- 提高数据质量和有效度，解决发展合作计量方面的差距，如按性别分列的官方发展援助，同时减少不必要的报告负担。
- 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7.3.1 的数据收集。

³⁵ 见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2024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见脚注 2)。

计量影响

46. 对国际发展合作的呼吁越来越多，使人们更加关注如何理解和计量发展合作的影响，既要确保资金的价值，又要加强问责制和学习。更好的计量也有助于向议会和合作伙伴报告发展合作活动和成果。

47. 在私营部门工具或混合融资等新模式下，计量影响尤为重要。在没有评估影响的情况下，混合融资的数量目标很可能导致预期杠杆率最高的交易，通常是中等收入国家的大型交易，即使没有官方的“甜头”，也接近盈利，不一定会产生最大的发展影响。计量影响并不简单，特别是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成果是长期性，需要谨慎行事，以免给各国增加不必要的报告负担。这也可能需要许多发展伙伴机构改变文化。

48. 多边开发银行最近的举措表明，它们正在努力将机构方法从注重融资量转向注重融资产生的影响。一些多边开发银行现在通过事前和事后评估报告项目一级的影响，通常提供按性别分列的数据。^{36, 37} 然而，迄今为止，大多数进展是在定义和计量气候减缓和适应相关影响方面取得的，需要开展更多工作，以推进发展影响的定义和计量，并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框架为基础进一步做出努力。

49. 还需要更好地了解多边开发银行之间以及多边开发银行与其他发展伙伴之间在计量方面的异同，以及私营部门的相关努力。虽然不同的行为体、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国情可能需要使用不同的计量标准，但有必要促进对什么是发展影响的共同理解，并加快努力制定可适用于所有行为体和模式的核心计量标准。

50. 政策建议：

- 为金融和非金融发展合作制定影响计量框架，同时不给各国增加不必要的报告负担。
- 改进影响计量框架以确保气候融资的额外性。

五. 交付方式

51. 随着发展合作的提供者激增，发展合作的交付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影响到其质量、影响和效力。最值得注意的是，援助的发放越来越多地绕过发展中国家政府。2022年，近五分之四的项目由非政府实体实施。³⁸ 随着纵向基金和融资机制的激增，特别是在气候领域，支持发展合作催化作用的模式(如催化私人资本)越来越受到关注。然而，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说明不同模式最有效并有助于实现不同目标和优先事项的条件和背景。

³⁶ 见 www.newprivatemarkets.com/in-brief-world-bank-reforms-impact-measurement-framework/。

³⁷ 见 www.cgdev.org/media/mdb-reform-tracker。

³⁸ 见世界银行，《为未来融资：国际开发协会在不断演变的全球援助架构中的作用》(2024年4月)。

52. 与项目型干预措施和对基金和融资机制的专用捐款相比，预算支助被广泛认为是一种能够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核心系统和机构、建设复原力和国家主权的模式。增加以政府预算未指定用途捐款的形式提供给伙伴国家的流量份额，可以增强核心能力、系统和机构，使政府能够更充分地承担确定优先事项和规划进程的责任。与基于项目的融资相比，这种办法通常会降低行政费用，同时加强国家主权和机构能力。

53. 然而，自 2015 年以来，预算支持一直停滞不前。最近的数据表明，一般预算支助仅占 2022 年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 3.35%。与基于项目或部门的发展融资相比，更一致地报告预算支助情况可进一步支持对非专用资金的影响评估。

54. 预算支助在官方发展援助中所占份额一直很低，这反映了援助方和受援方面面临的复杂挑战。发展伙伴经常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财政管理能力和有效的问责框架表示关切，公共采购系统中的腐败风险可能会削弱公众或政治对官方发展援助的支持，从而危及未来的供资承诺。发展中国家面临复杂的治理改革和僵化的业绩评估框架等条件。这些要求往往会造成巨大的报告负担，但因政治考虑而经常暂停预算支持则会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要充分利用预算支助的潜力，就必须进一步分析最适合预算支助的背景，并在问责措施与最初使这一模式具有价值的灵活性之间进行仔细的校准。

55. 过去几十年来，专用资金和融资机制的分配方式越来越突出，部分原因是它们采取了注重成果的办法，帮助发展伙伴维持国内对官方发展援助承诺的支持。专用资金和融资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大，再加上对发展中国家预算的规避做法，引起了人们对国家主权以及与国家优先事项而不是捐助方优先事项保持一致的关切。建立平行的供资和管理系统，加上重点领域狭窄，也可能与现有的体制框架不一致。这促使人们呼吁增加对多边发展融资提供者的核心捐款，以加强系统和服务提供能力。在 2011 年至 2019 年期间，基金支出的每 1 美元仅产生 60 美分的直接支持，而多边开发银行每支出 1 美元，产生 170 美分的直接支持。这种效率差距提出了关于发展筹资机制最佳结构的重要问题。

56. 自 2015 年以来，人们对利用私人融资和使用混合融资的兴趣也有所增加。然而，尽管通过官方部门的混合融资活动从私营部门筹集的资金稳步增长，但仍远低于预期。迄今为止，混合融资仅筹集了约 2 300 亿美元。³⁹ 由于重点主要放在调动的私人资金的数量上，而不是影响上，混合融资活动也往往有利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低风险状况。根据 2024 年发展合作论坛的调查，只有 19% 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17% 的最不发达国家和 19% 的内陆发展中国家报告混合融资是一种常用的发展融资形式，而在中上收入国家中，这一比例为 37%。

57. 为了实现其潜力，包括在需要支持调动私人资本的挑战性背景下，需要一种新的混合融资方法，该办法是从寻找最具银行吸引力的项目转向寻找影响力。这将需要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气候行动国家自主贡献更密切地协调一致，包括可能与拥有这些战略和贡献的国家的国家发展金融机构合作。它还包括按

³⁹ 见 <https://www.convergence.finance/blended-finance#definition>。

照《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要求，设计确保公平分担风险和回报的模式，例如允许公共合作伙伴分享财务收益的机制。促使评估财务回报和发展影响的条件表和框架标准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加快在高影响领域部署混合融资。

58. 发展模式的转变突出表明，需要更好地了解不同类型和模式的发展合作的作用和比较优势(以充分发挥协同作用，避免重复)，并将每一种合作的重点放在它们能够对可持续发展产生最大影响的地方。这就需要清楚地了解资金流动的概况以及各国的条件，商定什么是发展影响，并利用影响的证据来指导各种交付模式的分配选择。

59. 政策建议：

- 继续建立关于发展合作模式在不同背景和情况下的效力和发展影响的证据基础，以制定更好的框架，有效利用混合融资等不同模式。
- 发展合作模式和工具应尊重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国情，与其优先事项和需求保持一致，同时促进使用国家系统和成果框架。
- 继续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财政管理能力和有效的问责框架。

六. 有效、高质量和高影响的国际发展合作原则

60. 过去几十年来，在不同的论坛上制定了各种原则，以指导不同行为体有效利用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形式的国际发展合作。这些原则包括《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所载的一般原则、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对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义和有效发展合作全球伙伴关系所载的原则、指南南合作的原则、气候融资原则以及针对混合融资的各种原则。

61. 然而，国际发展合作的趋势表明，自 2015 年以来，遵守这些原则的情况有所减少。这突出表明，需要确保有效的发展合作作为一种战略方法和共同承诺，在当今参与发展合作干预措施的更广泛的行为体中产生共鸣，包括传统捐助者、南方伙伴、多边开发银行和更广泛的跨境运作的公共开发银行系统、私营部门行为体以及慈善机构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鉴于人们广泛认识到现有原则的持续相关性，国际发展合作还要求重新评估这些原则在当今背景下的解释和适用，并改革发展合作架构，以加强监测和问责。

62. 大多数发展合作原则都有共同的思路，强调国家主权和发展伙伴的协调一致的重要性。例如，这些原则反映在促进有效发展合作全球伙伴关系原则中，同时注重成果、透明度和相互问责。自《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以来，发展合作格局的演变，特别是南南合作日益突出，带来了新的层面。2019 年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重申了尊重国家主权、国家主权和独立性以及平等、无条件、不干涉内政和互惠的南南合作原则。

63. 发展合作论坛调查的数据显示，到 2024 年，83%的发展中国家将强有力的国家主权确定为推动在它们国家开展发展合作积极变化的关键因素。然而，

国家自主权的传统概念虽然是基本概念，但已证明不足以实现真正由需求驱动的发展成果。经验表明，目前的自主权努力并不能保证与国家需求和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因为资金分配往往继续反映捐助方的偏好，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发展目标。这种不协调尤其明显，例如在气候融资方面，脆弱国家可能优先考虑适应措施，而不是减缓努力，但却发现自己受到捐助方主导的供资优先事项的限制。

64. 国家领导超越了传统的所有权，强调发展中国家在直接制定发展倡议方面的作用。这一演变要求权力动态发生根本性转变，由发展中国家带头确定优先事项、设计干预措施和确定执行办法。在应对气候变化、大流行病防范和数字化转型等复杂挑战方面，这种领导力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当地情况和优先事项对于有效应对至关重要。⁴⁰ 最近的全球危机经验突出表明，国家在发展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十分重要。在协调国际支助并使之与国家优先事项相一致方面表现出强有力领导能力的国家在应对危机和恢复方面取得了更好的成果。⁴¹

65. 政策一致性是加强国家领导的另一项重要原则。全球挑战的相互关联性要求发展合作超越孤立的基于项目的办法，转向更加综合、系统的解决办法。发展合作伙伴必须确保其贸易、金融、技术和环境保护政策积极支持——而不是破坏——其发展合作目标。这就需要积极主动地查明和处理国内或国际政策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发展成果的情况。

66.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通过以及全球环境的变化，包括系统性风险的增加，可能需要重新制定原则，以认识到这种变化对发展合作方法的影响。例如，不断上升的系统性风险突出表明，需要将复原力纳入主流，并在发展合作干预措施中考虑可持续性的所有层面(经济、环境、社会)，同时考虑到一个领域的政策选择可能对其他领域产生的潜在利弊，以及各国融资体系承受未来冲击的能力。目前正在利用国家综合筹资框架将这一办法纳入国家一级筹资决策的主流，并有进一步加强利用的余地。⁴²

67. 政策建议：

- 振兴、精简和包容性的有效发展合作原则。
- 提升国家领导能力，使其超越传统的自主权，包括通过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自主贡献和综合性国家筹资框架的可能合并或更有力的协调，这应成为国家一级发展合作分配决定的基础。
- 促进政策一致性是加强国家领导的另一项重要原则。

⁴⁰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2 年发展合作论坛调查研究报告：驾驭 COVID-19 复苏和长期风险。

⁴¹ 同上。

⁴² 见 https://inff.org/assets/DESA_deep_dives/inffs-and-dc.pdf。

七. 改革国际发展合作架构：加强可持续发展的一致性和影响

68. 国际发展合作日益复杂，加上合作模式与发展中国家不断变化的需求和优先事项之间持续存在不协调，要求对发展合作架构进行根本改革。随着各国在重多的全球挑战中追求可持续发展，调动和协调不同形式的发展合作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合作包括财政资源、能力建设、技术开发和转让以及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

69. 改革后的架构必须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协调各种伙伴和资源，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该架构还必须促进合作流量与国家需求和优先事项之间的更好协调，降低交易成本，加强相互问责，并促进不同形式发展合作的政策一致性。这需要在多个层面进行协调一致的变革——加强国家自主和国家主导的战略和国家协调机制，加强区域合作平台，更新全球机构和论坛，以更好地满足当前和未来的需要。

使国家一级的架构合理化

70. 国家主导的有效协调仍然是使国际发展合作与国家优先事项和需求相一致的基础。2024 年发展合作论坛调查的证据强调了在建立强有力的协调机制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持续的挑战。

71. 国家拥有和领导的计划，将国家自主贡献、综合性国家筹资框架和其他计划结合在一起，必须成为协调的基础。这些计划应列出需求评估和战略(如在综合性国家筹资框架中)，包括发展伙伴可通过国家发展合作政策对国家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作出最佳贡献的领域。2024 年发展合作论坛调查发现，虽然 61% 做出答复的发展中国家有某种形式的国家发展合作政策，但在设计和实施方面仍存在能力差距。在有国家发展合作政策的国家，这些国家有效地与合作伙伴接触，并促进使用国家系统和成果框架。未来的发展合作论坛调查应评估国家发展合作政策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和筹资战略，如国家自主贡献和综合性国家筹资框架，以及这些规划机制的一体化和一致性程度。

72. 由国家主导的协调平台，如国家发展合作论坛、在综合性国家筹资框架范围内建立的协调机制，以及最近由多边开发银行主导的国家平台，已成为将政策转化为实践的重要工具。经验表明，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协调解决办法。各国根据具体情况、需要和优先事项调整其方法。作为 2024 年发展合作论坛调查的一部分，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深入访谈表明，一些国家采用了由技术工作组支持的部长级论坛的系统方法，而另一些国家则倾向于灵活的双边安排或临时协调。

73. 不同平台的有效性差异很大。2024 年发展合作论坛调查显示，虽然 62% 的被调查国家建立了某种形式的国家发展合作论坛，但只有 38% 的国家报告协调工作取得了很高的成效。这一差距既反映了能力制约，也反映了发展合作格局日益复杂。为双边捐助者和多边机构设计的传统协调模式现在必须容纳更广泛

的行为体，包括南方伙伴、私营部门伙伴、地方和区域政府以及民间社会组织，有效地将传统捐助者和非传统发展伙伴聚集在一起，进行协调一致的对话。

74. 这些办法的成功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国家自主和主导的计划和筹资战略以及强有力的国家领导、让不同利益攸关方参与的包容性对话机制，同时保持战略方向，以及强有力的协调和监测机构能力。根据国家的优先事项，这些平台可能还需要在国家领导下共享分析和诊断，为可投资交易制定投资和项目准备计划，以及项目管道。这些平台以国家自主的计划为核心，可以支持知识共享和相互学习，并加强发展伙伴和其他相关行为体之间更有效的分工。

75. 2015 年以来，联合国发展系统在应对协调挑战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四年期全面政策审查是大会评估联合国发展合作的主要工具，显示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所阐明的联合国发展系统的各项活动与国家需求和优先事项之间的一致性有所改善，94%的发展中国家报告 2023 年密切一致，高于 2019 年的 81%。这种一致性已转化为联合国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交付的更有效支持，96%的东道国政府肯定了这一有效性。东道国和捐助国都认为，经过改革的驻地协调员制度加强了一致性(分别为 84%和 83%)。⁴³ 然而，在精简联合活动、确保全系统一致性以及加强与非联合国行为体的一致性方面，仍然存在挑战。

76. 政策建议：

- 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加强国家自主和国家主导的协调平台，以国家自主和国家主导的计划为核心，汇集所有合作伙伴，包括多边开发银行、其他公共开发银行、双边合作伙伴、联合国系统和民间社会组织。
- 加强使用国家系统和成果框架。

区域平台和办法

77. 区域发展合作与协调对国家机制起着补充作用。随着国际贸易格局的演变，区域办法对于寻求进入新市场和进入全球价值链高价值部分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变得尤为重要。这对于国内市场规模不足，无法独立吸引大规模投资或有理由进行产业升级的较小发展中国家特别重要。

78. 区域合作平台有助于促进区域贸易协定，促进跨境投资，发展共享基础设施，并促进联合谈判。以目标部门为重点的产业政策措施的区域协调也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多余的生产能力，同时提高投资回报。

79. 区域办法的价值不仅限于经济协调，还包括应对共同的环境挑战、管理跨界资源以及促进面临类似发展挑战的国家之间的知识交流。要实现这一潜力，就必须解决区域组织的能力制约问题，加强区域、国家和全球发展合作机制之间的协调，以加强互补性，同时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努力。

⁴³ 见秘书长有关大会关于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联合国发展系统的资金筹措的第 75/233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主要结论非正式摘要(A/79/72/Add.1-E/2024/12/Add.1)。可参阅 <https://ecosoc.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5/2024-QCPR-SG-report-summary.pdf>。

80. 政策建议：

- 加强区域知识共享与合作。
- 加强区域开发银行与其他行为体的协调。

全球架构改革

81. 在全球一级，更新后的国际发展合作架构必须使国际发展合作的宗旨以及不同行为体和模式在促进实现这些宗旨方面的作用和潜力更加协调一致。加强政策对话和知识共享平台，必须以更有成效的方式将所有行为体，包括传统和新兴行为体聚集在一起。在尊重不同形式发展合作的不同目的和模式的同时，合作伙伴应努力减少不必要的分散和交易成本，确保发展努力由国家优先事项和战略驱动。

82. 2025 年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正在审议加强全球发展合作架构的途径。其中包括加强发展合作论坛，作为一个全球性多方利益攸关方论坛，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发展伙伴聚集在一起，履行其最初的任务，“审议国际发展合作的趋势，包括战略、政策和融资问题，推动不同的发展伙伴彼此进一步协调发展活动，并加强联合国规范性工作与业务工作的联系”。发展合作论坛应成为会员国和利益攸关方的有效空间，以便：

- 使发展合作与国家需求和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包括评估各种形式的支持如何影响发展道路；促进不同行为体和活动之间的协调和互补，重建对国际发展合作的信任。
- 分享各种合作模式的经验教训，重点是加强国家领导。这应包括交流有关在不同情况下交付方式(例如，预算支助、混合融资)适用性的知识。它还应包括分享以国家计划为核心的协调平台的使用方法，以调动和管理发展合作。
- 审查现有的有效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并提供平台，以便根据各国的国情、需要和优先事项，努力更新原则并制定关于灵活执行和适用这些原则的指导。
- 通过多方利益攸关方关于计量发展影响的对话，加强监测和问责，改进框架，以把握金融和非金融合作，同时加强国家自主权和领导权。
-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一致性，包括记录成功的政策一致性改革，并研究不同的政策和方法如何影响国际发展合作支持各国发展优先事项的能力，特别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弱势国家；鼓励发达国家在其自愿国别评估中评估其贸易、金融、技术和环境政策如何与其发展目标 and 做法保持一致并对其产生影响。

八. 结论

83. 国际发展合作在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优先事项方面面临根本性挑战。尽管官方发展援助创历史新高，但目前的分配模式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需求，特别是对最脆弱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不符。对全球优先事项的日益关注有可能使国家确定的发展需求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蒙上阴影。从国家优先事项转向气候和人道主义应对，加上赠款份额下降，减少了可用于长期发展的资源。

84. 随着新的行为体、伙伴关系和方法的出现，情况变得多样化，为各国获得不同形式的支持提供了机会，但支持也日益分散。经验表明，有效发展合作的原则，尤其是国家领导权和与国家需求和优先事项保持一致，仍然具有高度相关性，但可加以更新，以更明确地反映不断变化的全球背景，例如在各种发展合作模式中复原力的重要性。

85. 这些转变要求进行超越传统政策和做法的根本改革，以确保一切形式的国际发展合作积极支持国家领导和国家优先事项以及发展影响。2025年的发展合作论坛和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为振兴现有承诺提供了重要机会，同时调整政策和做法，以应对新出现的挑战，提高国际发展合作的质量、效力和影响。
